学林

夏鼐先生读书之“勤”与“广”

郑伟

夏鼐在日记中袒露心迹：“自己本来预备弄的是中国近世史，这次突然考上了考古学，这样便要改变我整个一生的计划，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改变，我并没有预料到，我有些彷徨无主。”

1934年10月4日，夏鼐先生（1910—1985）在写给刘古谛的信中，生动地描述了自己的学术志向，“我初入大学的一年是弄社会学的，后来转入历史系，已经是十字街头钻入古塔中，但是对于十字街头终有些恋恋不舍，所以要攻中国近代史，以便进一步剖析当前的社会。现在忽而改读考古学，简直是爬到古塔顶上去弄古董。离十字街头更远了，喧扰的市声，渐隐渐微了。”（夏鼐《燕园·清华园日记》）不过，据汪远涵、王祥第等故友的回忆，夏鼐之所以改学考古学，还有一段“插曲”在其中，“比夏鼐早一年毕业留校的历史系当助教的杨绍震来找夏鼐，杨说欧州近代史这门考试我已准备一年时间了，你若也报考欧洲近代史，那我必将落第了。……夏鼐同意了杨的要求报考考古学了。榜示后，夏和杨都录取。”（王世民编《考古泰斗夏鼐》）

王世民谈及夏鼐早年“改行”的缘由时说，尽管夏先生“考古情结由来已久，早在童年时代便收集过古钱；就读于燕京和清华时期，先后参观过北京故宫、历史博物馆和地质调查所；对瑞典学者安特生在周口店发掘所获人类化石及石器、古器等文化遗物，在河南、甘肃采集的新石器时代彩陶等物，曾经发生极大的兴趣”，但仍对“近代经济史尚未忘怀，1935年招考的清华留美公费生有经济史一门，随即写信恳请校方‘通融’，将自己的专业改变为经济史，校方未予同意。既然夏先生一心出国留学，又不能改变专业，只好下定决心，‘咬牙硬干’这门考古学”。夏鼐先生在1934年10月2日的日记中袒露心迹：“自己本来预备弄的是中国近世史，这次突然考上了考古学，这样便要改变我整个一生的计划，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改变，我并没有预料到，我有些彷徨无主。”作为大学尚未毕业的年轻人，在终身志业的抉择上显出困顿迷茫，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以说，各种因缘际会，再加上自身的天资与努力，成就了夏鼐先生这位中国考古学界的一代大师。

夏鼐先生在考古学（埃及考古学、中国史前考古学、历史考古学等）、先秦史、科技史、敦煌学、中西交通史等领域，都有非常杰出的贡献。随着《夏鼐文集》《夏鼐全集》的相继问世，以及有关夏先生的多种纪念文集、日记、书信集、传记、影像辑等学术资料的出版，人们有机会全面了解夏鼐先生精彩而辉煌的一生。笔者拟从语言文字与南海史地两个方面，结合与先生有关的学术史资料，试谈对先生读书之“勤”与“广”的一点认识。

大学时代的夏鼐，以“读书之勤、读书之广、读书之精”闻名，亦曾获陈寅恪先生“读书细心，敬佩敬佩”的嘉许。夏先生在学习历史学、社会学之余，也常做各种哲学的思辨。如1931年11月4日所记，便带有语言逻辑的意味：“在王栻处谈到Eaton[伊顿]的*Logic*[《逻辑》]一书中，以抽象的个体物Universal[普遍性]与Singular[单一性]对待，我以为不大稳当，因为据伊顿的意思，单一性应该是(1)个体而非群体，(2)具体而非抽象，故抽象的不论个体或群体都应该归入普遍性（如权利、爱情之类）。我以为分类的标准，仅可有一个，如有两个标准，那么如非‘不必要’（如相同）便是‘不可要’（如互相冲突）。”

1934年8月17日所记则是关于语言学与文化人类学之间密切联系的思考，“阅书：Kroeber, *Anthropology*[克罗伯：《人类学》]。其中论及言语及其他文化因子之联系性，颇可为近来讨论欧化语者之参考，即对于大众语的争论一问题亦不为小助。……我以为大众是否有能力创造大众语的文学，而不是现在冒充大众语作家者假装不三不四的大众语文学。大众的文化一般地升高，侵入文学中便会使文化自然地大众语化了。”

夏鼐从燕京转入清华历史系后，修读了“中国通史”“甲骨文字研究”等课程。1934年8月，夏鼐参加公费留美考试，顾颉刚先生所出“中国上古史”试题，包含“殷墟文字”和“毛公鼎”“虢季子白盘”“石鼓文”等，夏鼐考出了九十五分的好成绩，足见其语言文字学方面的优良基础。《言语和中国文字二者起源的比较》（林语堂著、夏鼐译）、《宾词数量限制说之批评》则是夏鼐早年所撰（或译）直接关涉语言文字之学的著述。

1935年9月，夏鼐留学英国，先后在艺术研究所、伦敦大学学习考古学，“一方面继续阅读西文考古学书籍，一方面对于中国金石学及文字学等与考古学有关者，加以学习”（王世民、汤超编《夏鼐书信集》）。因虑及“如欲学埃及、希腊、罗马考古学，须先学文字，至少须费二年功夫学习文字”，故有“转学爱丁堡学习史前考古学”的打算，然而“攻史前考古学，对于未曾学习过之地质学及解剖学等，亦不得不补习。是以事实上必须再读二年，以学习基本科目”。

在此期间，他对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著作颇有留意。如1937年3月19日记：“听Karlgren[高本汉]讲演Evolution of Chinese Language[中国语言学的演进]。”1938年6月5日：“阅毕Karlgren, *Sound and Symbol*[高本汉：《语音与符号》]（pp.1-112）。此书为通俗性质之书。关于音韵学部分，虽极简略，颇多作者创见。文字学部分，则甚浅薄。书中时有误解中文之处，如：p.46谓‘束肉’（‘Tied meat’meaning ‘teacher’s fee’）似为束修之误。p.71将名词父兄解为father’s brother。p.63谓蒙恬造驼毫笔camel’s hair brush，未免伪造史实。p.60谓笔顺有一定次序，引‘女’字作一+く+丿=女，也是该打手心（因为中国人写此字顺序为く+丿+一，故草书作‘め’）。”

夏鼐的论著目录中有一篇题为《一个古埃及短语在汉语中的对应例子》的短文，是不折不扣的语言学论文。他在1937年11月5日简单记录了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今天念到*Late Egyptian Stories*[《新埃及文故事》]中Horus and Seth[荷鲁斯与塞特]，他们喝惯了牛奶的毛子看不惯。我拿中国‘乳臭小儿’一语来解释，伽丁纳尔教授很高兴，叫我写下来，交给*JEA*[《埃及考古学杂志》]去登载”。30日记道：“阅毕Chester Beatty, *Papyrus I*[切斯特·贝蒂：《纸草文稿》之一]关于荷鲁斯与塞特的故事（预备埃及文读本原文）”。1940年4—5月完成的《关于贝克汉姆岩的几点评述》，“发现埃及象形文字新材料”，并与艾伦·罗威先生就“祭坛”旧说抑或“塔门”新释之优劣进行辨论。1965年10月16日，夏鼐致郭沫若函，论及埃及象形文字、苏美尔楔形文字及两河流域之最古文字，甘肃辛店彩陶图形、朱家寨仰韶文化墓葬所出骨板符号、广西花山岩画图像是否为原始文字等，对文字起源的普通文字学问题发表了看法。

中西交通史是夏鼐先生用力甚勤的领域之一。《西洋种痘法初传中国补考》《略谈番薯和薯蓣》《“和阗马钱”考》《作为中非交通关系证据的瓷器》《和田马钱考补说》《汉唐丝绸和丝绸之路》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论文。夏先生治此学，擅长利用所掌握的多种语文知识，从考古资料切入，结合传世文献，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探寻名物的传播方向与路线。

《夏鼐书信集》收录了1979年10月至1984年11月期间，夏鼐写给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的六封长信，以及谭先生的两封复信，专就谭著《七洲洋考》《宋端宗到过的“七洲洋”考》诸文展开往复讨论。夏先生对谭著所说的“时至今日，认真整理南海诸岛的历史已为我历史学者一项迫切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我们不能容许错误的说法再广为传播下去了”这一呼声，作了极为严谨、认真的回应。

以《书信集》为例，除了谭先生之外，夏鼐在致梅冷生、韩儒林、李德清、罗荣渠、吴德铎等的信函中，都曾或多或少地谈及南海史地之问题。其1962年日记中所提到平时的阅读资料，涉及此的例如：“阅马欢《瀛涯胜览》（冯承钧校注本）”“阅Miller[米勒]的《北周书》异域传的英文译注本”“阅向达《蛮书校注》”“阅《中印政府官员谈边界问题的印度方面报告》（1—114页未完），写的很长，但多不切题，更有些怪话，如为英帝国主义辩护，及对史料强不知以为知（印方72页，以为有隋裴矩《西域图志》的地图）”等，也都是相关的工作。

夏鼐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热心推动先贤的重要著作整理出版。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便是有关元代周达观撰《真腊风土记》（以下简称“真腊”）的校勘注释。该书是了解当时真腊（今柬埔寨）等南海诸国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的重要文献。为此，夏先生努力寻访《真腊》的各种版本。1961年2—3月的日记多有记述。次年4月5日，温州籀园图书馆的梅冷生馆长致夏鼐函说及：“托查温州刻本《真腊风土记》，元序跋末页亦残缺。其板尚存文管会。张宋颉知其来历，出瑞安许氏仿宋巾箱板本，前由宋墨庵介售于我。兹检原书奉寄，或出四库本翻刻也。其中各则文字并未缺少，孰当孰失，未取各本细对，幸恕谅。”此函另有附记：“《真腊》不必急急寄还，将来连同其他书同寄。”不巧的是，《真腊》该刻本在托亲友带回温州途中遭窃。梅馆长后来致夏函说：“《真腊》板片存，后可印制。”

1976年，夏鼐又开始为《真腊》一书忙碌。11月3日记，“上午中华书局谢方同志来，希望我明年能将《真腊》的校注本交稿”。1979年，夏先生将王祥第请至北京中华书局，这对“三同”（同乡、同学、同庚）之交共同推进《真腊》的校注工作。这年秋冬，是两位集中编辑书稿的重要时期。12月9日，《真腊》书稿宣告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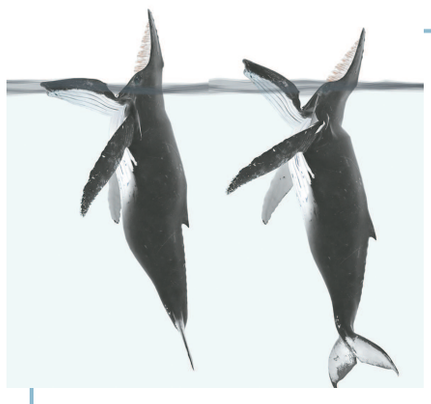
1981年1月6日，中华书局将《真腊》三校交给夏鼐。数天后，夏鼐看完最后一次校样。同年3月，该书正式出版。从开始为撰著此书而搜集各种《真腊》各种版本，到最终问世，前后整整二十年。书稿出版之后，夏鼐先生仍然很注意搜集相关资料，作为日后续补之用。

“我对于宋元史及东南[亚]史，皆非所长。《[真腊风土记]校注》乃旧作加以整理，或许能供学者之参考。”1983年5月1日，夏鼐在致李德清的信中如是说，庶几可以视为夏先生撰著此书初衷的简洁描述。徐苹方先生作了如是的评价：“他能够从考古学的研究兼做古籍整理工作，这是我们前辈学者在学术研究上的优势，他的《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便是古籍整理方面的杰作。”

夏鼐先生读书广博、精深，而且平易近人、态度谦逊，但同时也有不平则鸣的严肃一面。李汝宽先生回忆夏鼐曾在一封信中对其使用英文名沙米（Sammy）颇不以为然，“程尊函副本，实则报道先生时，何不用‘汝宽’大名？不仅沙米伤牙，而且读之实觉洋味过重”。夏先生还会激越直言：“我也知道现下有些大人物，信口发表关于这些专门学科方面的意见，高谈阔论，基本不知道自己所谈的是什么学、什么学是什么东西。我希望像足下这样专攻冷门学问的专家，不要凑热闹，以免把学术研究引入歧路。”

最后还可一提的是，夏鼐先生身居要职，公务繁冗，与中外学界学人的书信往来，自然是措辞谨严、不卑不亢，但同时又有率真诙谐的一面，比如在给王栻先生等交情极为笃深的同乡、同学的信中，就能读到调侃式的幽默文字，“不意冷门近来忽然走运。‘文物外交’不仅国内要招待外宾（包括外籍华人的‘二毛子’，如何炳棣流）”，更有“王道士”“景荣公”等对老友的戏称。至此，一个生动鲜活的长者形象，宛在目前。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 约翰·麦卡锡绘制的座头鲸陷阱捕食示意图

▲《王者镜鉴》手抄本，约1250年

▲ 在“岛”上生火做饭的人被大鱼掀翻的图景，约作于1270年

均资料图片

资讯

哈夫古法的陷阱

编译/本报记者 李纯一

大鲸垂直停在海中，一动不动，仰头张开大嘴，口鼻突出于水面，像是海平面立起一个九十度角的洞穴。小鱼纷纷跳上来。不多久，大鲸合上嘴，小鱼们被“鲸吞”了。

2010年代，科学家们才观察到鲸类这种奇特的捕食方式。2011年，泰国湾的布氏鲸在水面上以直角张开下颌，科学家们称这一行为是“踩水进食”（tread-water feeding）。大约在同一时间，加拿大温哥华岛附近的座头鲸也出现类似的行为，又被冠名为“陷阱捕食”（trap-feeding）。

不过最近，人们发现，这种不寻常的捕食技术在两千年前就有记录。

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博士是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弗林德斯大学的海洋考古学家，他在阅读北欧神话时发现，有一种唤作“哈夫古法”（hafgufa）的海洋生物，对它的描述似乎完全符合上述进食行为。哈夫古法字面义为“海上蒸汽”，被认为是出没于格陵兰附近水域的一种海怪。“这真是一个巧合。”麦卡锡说，他读到这段古代文献，是在看到鲸类踩水进食视频的一年后。他与同伴的这项研究发表在《海洋哺乳动物科学》杂志（2023年2月号）上。

古代文献中关于这种行为的描述不止一处。最早的描述出现在《博物学者》（*Physiologus*）中，这是一份成书于公元二世纪中叶之前的亚历山大城的希腊手稿，在中世纪早期的流行程度仅次于《圣经》。书中保存了从印度和中东带到埃及的动物学信息，这些信息来源于自然史学者（包括希罗多德、克特西亚斯、亚里士多德和普鲁塔克）、商人和旅人。编纂者认为其中的动植物与风土描述都是自然科学的“真实”，因此自称“博物学者”，尽管其中还一板一眼地著录了塞壬海妖、独角兽等人类幻想中的生灵。

在《博物学者》中，古希腊人将这种生物称为aspidochelone，意为盾龟。一个现存版本的描述如下：“当它饥饿时，便张开嘴，从嘴里呼出某种好闻的气味，这种气味一旦被小鱼察觉，它们就会聚集在它的嘴里。但当它的嘴里装满各种各样的小鱼时，它突然闭上嘴巴，把它们吞下去。”

最详细的描述则出现在13世纪中叶古挪威语的*Konungs skuggsjá*（《王者镜鉴》）中：“我们叫它哈夫古法……觅食时……这大鱼张开嘴一段时间，嘴开似一个大峡湾，不知不觉中，鱼群就涌进来了。把肚皮和大嘴都装得满满当当以后，[哈夫古法]就闭上嘴，这样就把所有来寻食的猎物一网打尽，藏在里面。”

《王者镜鉴》是用于君主教育的读本，其中保存了北大西洋水域真真假假的海洋生物的记录。长期以来，哈夫古法都被认为“应归入奇幻世界”。但是麦卡锡说，虽然叙述者夸大了尺寸……却并非全然超自然的幻想性描述。

麦卡锡还表示：“哈夫古法让这些学者感到沮丧，因为他们搞不明白它对应的是什么动物。”毕竟当时的学者还无法分辨鱼类和海洋哺乳动物之间的区别。“现在，我们认为我们有了一个解释。”

他们认为，哈夫古法就是大鲸，它的这种捕食技术之所以能成功，关键在于大开的鲸嘴仿佛提供了一个明显的庇护所，小鱼会本能地朝它涌去。其实，不单小鱼会误认，人类也会。人们觉得它就是一座岛。《一千零一夜》中航海家辛巴达的故事里，船上的旅客中途登岛休息。正当他们生火做饭的时候，船长发现这岛摇晃起来——“这不是什么岛，而是漂在水上的一条巨大的鱼！”他呼喊着让大家赶紧上船，因为那条受热摇动的大鱼一旦沉下海面，“岛”上的人都会送命。梅尔维尔《白鲸》里也有大鲸像岛屿的描述：“那条大鲸在那里面滚动它那岛屿般的身体……”小说开头的图书馆员选录里，也有好些诗人所见略同，如弥尔顿《失乐园》：

“那利维坦
最大的动物，像个海岬
躺在海里睡觉，游泳，
像块流动的陆地，它的鳃吸进
一个大海，又把大海喷出来。”

蒙哥马利《大洪水前的世界》：

“从可怖的利维坦到昆虫，
无数生物群集波涛，
鲸，鲨鱼，巨兽，
它们受着神秘的本能的指引，
成群结队，有如浮动的岛屿”

研究者们觉得有趣的是，鲸类的“这种进食方式在几千年前就有记载，但在最近几年却被描述为一种新见技法”，并推断“陷阱捕食很可能只有在存在其他捕食者的情况下使用”，因为这是在个体鲸身上观察到的，并不是一种社会性的捕食活动。“它对鲸的体能要求很低，所以只有在捕食狂欢后，仅剩下较小的鱼群时最有意义。”也有研究者认为，鱼群密度很低时，鲸也会使用这种节省体能的方式，因为太用力显然得不到相应的回报。

文匯学人 第540期

黄体芳致孙锵鸣信中的书院往事

王新宇

晚清温州地区涌现出许多知识群体，主要有孙氏家族、黄氏家族等。其中孙氏衣言、锵鸣、诒让并称“三孙”，黄氏体正、体立、体芳、绍箕、绍第并称“五黄”。“三孙五黄”一时名震浙东、名扬全国，为晚清温州官学两界的代表性人物。近见陈烈主编《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下简称《书札》）中收录了黄体芳写给孙锵鸣的六通信札，内容涉及南菁书院等事，是研究黄体芳的重要资料。

黄体芳（1832—1899），字漱兰，号循引、莼隐，浙江瑞安人，人称“瑞安先生”。咸丰元年举人，同治二年进士，选庶吉士，初授翰林院编修，于光绪六年至十一年出任江苏学政，八年十一月，擢兵部左侍郎。十二年，以忤旨降为通政使。十四年，典福建乡试正考官。清流中坚人物，与宝廷、张佩纶、张之洞有“翰林四谏”之称。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初九日，卒于里第，诰赠资政大夫。今有《黄体芳集》。

孙锵鸣（1817—1901），字韶甫，号藻田，晚号止园老人、止庵退叟，孙衣言二弟。浙江瑞安人。道光十五年举人，二十一年进士，入翰林，二十七年充会试同考官，李鸿章、沈葆桢出其门。道光二十九年典试广西，后留任广西学政。同治元年擢侍读学士，二年为武会试副考官，三年罢官。后主苏州紫阳书院、金陵钟山书院、惜阴书院、上海龙门书院等，育人无数。著《东瓯大事记》等。今有《孙锵鸣集》。

《书札》892页一通，未落年款，但据“新延山长张啸翁忽以疾辞”等内容，推断此信作于光绪十年正月二十二日（1884年2月18日）。因黄体芳是孙衣言的学生，故称孙锵鸣为世叔。信中黄体芳提及自己创办南菁书院，是颇费苦心的。

光绪六年八月，黄体芳出任江苏学政，于光绪八年八月连任，九月，择定江阴水师京口营游击、协镇两署故址为院址，筹建江阴南菁书院，取朱熹《子游祠堂记》“南方之学，得其菁华”之意。禀请两江总督左宗棠，左宗棠上奏：

“臣前接江苏学政黄体芳缄称，江阴创建经古书院，名曰南菁，仿诂经精舍之例，专课苏省经士。惟经费不敷，落成有待，请拨款接济，并请筹常年膏火之资等因。臣以学臣倡建书院，永为嘉惠士林起见，用意深远，通省士子愿入院读书，就正经史之学，概予收录，将来积学之士，发名成业者必多。黄体芳夙负文名，劬学攻苦，一时人望攸归，尤宜量为资助，以慰士情。臣捐廉一千两，佐书院工料费，并札两淮运司，淮北票费项下提银二万两，解由学臣饬交江阴县发商生息，以为每年膏火之资，官为经理，年终结算，申报学臣衙门，及移咨臣署备案，以专责成而备稽考。”

光绪九年秋，南菁书院落成。书院共六进，八十余间。第四进楼房为藏书楼，楼上中间奉汉郑玄、宋朱熹两大栗主，黄体芳亲自撰联“东西汉，南北宋，儒林文苑集大成于二先生，宣圣室中人，吾党未容分两派；十三经，廿四史，诸子百家萃总目之万余种，文宗江上阁，斯楼应许附千秋”，强调书院是汉宋之学并重，以及“东林讲学以来，必有名世；南方豪杰之士，于兹为群”。

信中张啸翁即指张文虎（1808—1885），字孟彪，一字啸山。著有《舒艺室杂著》《舒艺室随笔》等。在建设南菁书院期间，黄体芳于四月赴松江躬延南汇张文虎主书院讲席，据闵萃祥《州判衔候选训导张先生行状》载：“癸未，今学使少司马瑞安黄公体芳创建南菁书院于江阴，夏四月按临松江，躬延先生主讲席。时先生足痿，艰于行，再三辞不获。”张文虎遂于七月赴江阴上任，八月撰写《南菁书院记》。十一月，以足疾发作，两次致书黄体芳，“谓如文虎之流，斗量车载，宜别访高贤，以膺斯任”，请辞归里，让黄体芳另寻高贤。此信即是张文虎辞职后，黄体芳写给孙锵鸣的信。

信中述说张文虎因病辞职后，原先有意延请俞樾继任山长。俞樾（1821—1907），字荫甫，自号曲园居士，浙江德清人。道光三十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河南学政，先后主讲苏州紫阳书院、杭州诂经精舍、德清清溪书院、菱湖龙湖书院、上海求志书院等。著《春在堂全书》。与孙衣言三度同年，关系密切。奈何俞樾“虽愿就，而不肯常川驻院”，故转请孙锵鸣出任南菁书院山长。因孙锵鸣曾于同治四年主苏州紫阳书院，且厘定苏州正谊书院规条，又于光绪四年应两江总督沈葆桢之聘主南京钟山书院和惜阴书院，在江苏士人中有一定的影响力。黄体芳认为如孙锵鸣来江阴讲授，可传播永嘉学派思想。然而孙锵鸣并没有答应黄体芳的要求。南菁书院院长的继任者为黄以周（1828—1899），本名元同，后改名以周，以元同为字，号儆季。浙江定海人。任南菁书院院长长达十五年。

再看872页一通，略涉钟山书院。此信未署时间款，然据信中“伯陶世兄之没”“夏中投劾辞职”等信息，得知此信作于光绪十七年（1891）秋冬间。

“里门谒别”指光绪十四年，黄体芳典福建乡试正考官后，请假三月回乡扫墓，亦拜见孙衣言、孙锵鸣兄弟。孙衣言有《黄漱兰银台闽闱事竣，请假三月，展视松楸，承过访林下，赋此志庆》诗，以纪此事。

伯陶世兄指孙诒钧（1863—1891），又名德桢，字伯陶。孙锵鸣长子，光绪十四年优贡。于光绪十七年三月去世。

光绪十七年四月三十日，黄体芳上《病尚未痊吁请赏准开缺折》乞退。上谕云：“黄体芳病，请解任，允之。”即信中“夏中投劾辞职”。黄体芳开缺后，随儿子黄绍箕就养在京师。黄绍箕（1854—1908），字仲弢，又字穆琴，晚号鲜庵，浙江瑞安人，黄体芳子。光绪五年举人，六年进士，九年授翰林院编修。十年充翰林院撰文兼会典馆纂修提调，赏加侍讲衔。二十三年任湖北乡试正考官，二十四年任会典馆提调、翰林院侍讲、左春坊左庶子、京师大学堂总办。后任翰林院侍读学士、主持两湖书院、湖北提学使等职。著有《中国教育史》等。

黄体芳于光绪二十一年三月间离京，途中先到河南信陵书院任教，再到安徽，于九月到南京，寓张之洞督府。于十二月回到家乡瑞安。

信中李莼客指李慈铭（1830—1894），字炁伯，号莼客，浙江绍兴人。光绪六年进士，初任户部郎中，后官至山西道监察御史。上书言事，洞中利弊，不畏权要。中日甲午战争败讯至，感愤扼腕，卒于官。著《越缦堂日记》等。李慈铭与黄体立、黄体芳兄弟均有交情，又与黄绍箕是光绪六年同年进士。信中黄体芳听闻李慈铭拟出都，又闻孙锵鸣有辞钟山书院之举，想为李慈铭谋求钟山书院之职，亦见二人之间的交情。

岘帅指两江总督刘坤一（1830—1902），字岘庄，湖南新宁人。

仲容世兄指孙诒让（1848—1908），字仲颂（或仲容），号籀廎居士。孙衣言子。朴学大师，近代著名教育家。于同治六年中举人，此后八次参加会试，均不第。仕途上虽不顺，但在学术研究方面却成果卓著，著有《周礼正义》《墨子间诂》《温州经籍志》等。晚年投身实业、教育及文化启蒙运动，发起创办瑞安算学书院（后改名学计馆）、蚕学馆、瑞平化学堂，出任温处学务分处总理、浙江教育总会副会长等职，对浙南地区的教育发展做出杰出的贡献。被章太炎誉为“三百年绝等双”，郭沫若称其为“启后承前一巨儒”。

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初九日，黄体芳卒于里第，孙锵鸣挽以：“汲郑直节，枚马雄才，看儿辈词垣接武，名满寰区，早辞朝列赋归田，华发酡颜，日饮亡何，衔觞不知将老至；孔李通家，潘杨姻娅，忆少时江馆会文，义兼师友，讵料贤昆悲宿草，鬓年衰病，余生有几，扶筇又复哭君来。”对黄体芳的操守和才华高度评价，认为“直节”可与汲黯和郑庄比，“雄才”可与枚乘和司马相如媲美；其子绍箕、侄绍第均中进士，入翰林，接班有人，为之赞叹。下联则说孙黄两家交谊深厚，如同一家，追忆少年时与黄体芳长兄黄体正江上楼读书情景，不料黄体正于道光二十九年去世，黄体立于光绪元年去世，现在又要送别黄体芳，悲痛不已。